

人生典範

我在初中時就有了心中的典範，找一個典範是學做人與提升自己很重要的步驟與捷徑，但這典範我主張從自己的周遭找。找不到嗎？我才不相信！孔子說過：「三人行，必有我師。」身旁任何在某方面比自己強的人，他們都是自己的典範，典範更是學習目標具體呈現的優點。為什麼非得要把自己提高到史懷哲或居禮夫人的程度？我敢打賭回答史懷哲或是居禮夫人的這些人，他（她）們的知識來自傳記或自傳，我常問，如果你是以史懷哲為典範，會在畢業後到非洲去嗎？大多數的考生都啞口無言，回答不了我的問話。

——蘇森墉老師——

我的典範是竹中的合唱大師蘇森墉老師，蘇老師日前才因巴金森症而結束了他近十年的病痛生活。他生於台北延平北路，少時就搬到福建省，所以他受教育、成長皆在大陸，樣子看起來就是一副來自大陸的模樣。他出身於福建音專，也當過我們的班導師。

當然他教的是以音樂為主，但他多才多藝，所以有關人文的課他都可以代教。有一個難倒中國人的英文字叫“sophisticated”，這個字是「複雜難以理解」的意思，一般人用口頭解釋不清，就舉出實例以收立竿見影之效。這個字在竹中最好的實例，我認為是蘇老師，他對一般藝術的造詣不同凡響，「蒙娜麗莎」雖然不是蘇老師所繪，但他是我心目中的達文西。像他這種人，英文叫文藝復興型的人。他以身教言教引導了衆多學生走過在竹中的六個年頭，在黑板或週記本，也寫一手脫俗的字，洋溢著才華，他的文筆、水彩畫都超出一般的水準，而且擅長打籃球。他教我們唱的歌都是典雅超俗的，我們至今都還會哼呢！他自己也創作了不少歌曲，曾由在校友彙整成書，竹中的第一校歌就是他的作品。



蘇森墉老師與其夫人合照。

他不是一位嚴師，我從未見過他動怒，閒言不多，但很健談。畢業後週末南下趨訪，他和見識不廣的我非暢談直到深夜一、兩點返不了家，幾是例事，使我自己母親也嫉妒了起來。有人說過要贏得別人的欽仰萬不能強索，他就是以風範影響學子的，我們追隨的是他自然吐放的文化氣質，他強調我們如不能為創作家，也應為有品味的鑑賞家。蘇老師的提示，不知豐富了我這一輩子多少自樂的生活。

蘇老師從未洞悉我一直以他為典範的秘密，我有四件使我覺得與有榮焉的事，一、享譽全國的竹中合唱團的前身，是由蘇老師催生與指導的，當時我在裡頭擔任指揮的角色，我們曾在新竹的國民戲院公演過；二、由蘇老師與黃友棣所寫的竹中校歌也是先由這個合唱團練好，在週會演唱後由全體師生選定的；三、我曾是蘇老師女公子綠萍負笈美國時短暫的監護人；四、我曾經拼了命地模仿蘇老師的字體，學到令人真假難辨的地步，但最近連續兩次收到蘇老師書翰，我們倆人的字卻已顯得互不相似了。蘇老師不幸患有巴金森病，筆跡微微顫抖，看在眼裡使我百感交集，但昔日的字跡與才華仍然可辨。過多年之後，我們師生倆人的字跡已如此南轔北轍，正反應我們各走了數十年不同的路徑，經歷了不同的人生。但不管這代表多少滄桑，蘇老師仍舊是我心裡的達文西。

從一個典範學習有其極限，該學的都學了，這時就可以提升自己而另找「新歡」——

新的典範也無妨。舊典範的影響是停了，但對舊典範的敬意更要加倍，因為他是建立你一生有份的人之一，怎能忘掉感謝之意？我對蘇老師的敬意仍在，但因空間的改變，到台北念台大後，每次週末回到新竹，到蘇老師的家裡談



蘇森墉老師晚年照片。

天的習慣漸漸不再了。後來我開始覺得台大裡也有一教授稱得上是我新的典範。

那是林宗義教授，據稱他在約二十七歲就從東京回台灣建設台大醫學院精神科，將該科弄得有聲有色，在我國退出聯合國以前，林宗義教授還在世界衛生組織做過重要的職務。他造就了不少後代而因此桃李滿天下。他的父親是台灣的P.E.D.先驅，在二二八事件時神秘失蹤，後來才知道他已經被槍決。林教授是風度翩翩的學者，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碰到他，都會知道他是一位教授。他的外文已經到精通的程度，而學者的台風是他的長處，我當然希望有一天能像他一樣。

現在我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我六十多歲的時候曾經寫了封英文信，表示他曾是我的典範，使我暗地裡受惠很多，他也寫了一封很溫馨且充滿感謝的信給我，我將此段往來視為一佳話。

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對我們的家庭影響很大，所以不得不在此一提。我大哥是主張斯巴達式的，是一切都照規矩而嚮往軍國主義的人，他崇拜早期的希特勒，而日本的社會制度則很多都學自德國，自稱為東方的德國，大哥對此頗為心怡而雀躍。他對希特勒初期能發明建設高速公路印象尤深。我大哥的這種傾向，當然身為竹中的老師故不能表態太明，但他對大陸來的人所持的態度明顯和別人不同，帶有歧視的味道。

我們當時住的宿舍共四棟，兩棟一排座落在省立新竹醫院旁，隔壁是台灣女性嫁給大陸人的一家，當然不會引起我大哥的尊敬。斜對面也住了一戶姓陳的大陸人，他沒家眷，不管單身來台或是還沒結婚，反正是一個人佔住了一棟房子。這姓陳的年齡與大哥相差有限，更惹得大哥的反目與鄙

視。

西元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北發生二二八事件，很快地波及到新竹，但據我所知，大哥沒有親身加入暴亂。那時有一位畢業於日本京都大學，曾在日本岩波文庫做事的文人名叫黃金穗，黃先生是我大哥的摯友，他倒是親身參與。有一天晚上，他全副武裝，腳穿長統靴，來告訴我大哥戰況。黃金穗當時在台北的延平中學當老師，後來轉職新竹女中。由於日式房子隔音效果不良，而且蓋法是一棟挨一棟雙併的，因此當天晚上的對話，隔壁家都聽到了，這讓他們有情報可以向上面報告。當然對面姓陳的也在伺機報復，但我不相信這是唯一的遠因，我大哥平常的態度，以及我三哥在二二八時期在人去樓空的姓陳的家裡靜讀都可能是，誰知道呢？反正二二八時期是趁機打劫或張家的仇找李家報的時候。

二哥在台中師範求學，跟著他的同學一起作息，比較不受家教的影響，他曾經參與什麼活動我們當然無從知道，但也受了連累。

陳儀的增援部隊抵達基隆之後，二二八的情勢改變，國民政府佔了上風。有一天四點鐘左右，家旁來了一部吉普車，走下兩個彪型大漢進了我們家，母親一邊拭手一邊向前問：「您們要



李克承照片。

找誰？」這時大漢們說要找黃崑耀，母親不疑有它，叫來在後院做事的大哥，大哥放下手上的東西趨前來寒暄，正中大漢們的下懷，就這樣被帶走了。當時新竹有位日本長崎醫大畢業的醫生，名叫李克承，大家都叫他李博士，跟我們一家人頗為親近。他於大哥被帶走後五分鐘急匆匆地到我們家裡，他目睹大哥被大漢陪著上吉普車載走，覺得事情頗為不妙，於是來警告我們。可是老實而不知情的母親還對現實問題掌握不深，只覺心裡怕怕的。大哥就這樣被帶走了，連逮捕狀都沒有呢！（這一過程，我三哥的記憶與我有所出入，但這裡依我的記憶為故事的主體。）

話說那天晚上半夜，由里長林先生陪同蒙面的三、四個男人，把我們一家人叫醒，面向牆壁排成一列，對家裡做了一次徹底的搜索洗禮，連我父親在新竹縣政府供職一點都發生不了作用。

里長林先生是我竹中同學故林資賢的父親，但這又有什麼用呢？幾個大漢們翻箱倒櫃，弄得整個家紊亂不堪。我四姊還責備了這幾個大漢一番，想爭一口氣，但卻換回了幾個巴掌。整個家被搜索完畢，這些大漢們叫我二哥吃碗飯，穿上衣服跟他們一起走，二哥只好照做。就這樣不到二十四小時，兩個哥哥都無故銀鑰入獄，大哥被關了四十五天，二哥關了十五天，四姐因為父親認為風險太太，故送回後龍大伯家裡躲一段風聲。而我們家呢？可以說因而傾家蕩產。

事情的始末是這樣的，大哥被捉去後，可能是由新竹市警察局的後門進去，一過了後門，頭上就被蓋上一條毛毯，因此不知被帶往警察局的何處，只知道之後是一連串的拷打。說拷打也不對，因為沒有問話，也無從答起。拷打最難受的是叫他坐在一張板凳上，背靠牆，雙腳伸直，上放一橫桿，一端各坐一人以施加壓力，上身則用槍座硬捶。打得我哥唉叫連連，等投入監獄裡的房間時，一雙大腿已腫到非得由在同室坐牢的人設法把褲管剪開才可舒緩。那時我們也不知大哥可能是受到對面姓陳的或隔壁的那一家的陷害，或是單純的報復，反正過了幾天以後，好不容易才曉得大哥何在。那時真是風聲鶴唳，天氣又冷，一家人大夥兒白天也躲在棉被裡等看事情的演變。新竹以風大有名，任何的門窗因為風的吹動發出聲音都會使我們膽顫心驚。母親是很誠摯不渝的人，曾經到過

新竹南門派出所去跪過幾個「領導人」要求釋放我大哥和二哥，但也得要領。

這時，大姊夫再婚的妻子玉梅（與大姊已經辭世而做鱷夫的姊夫再婚的玉梅嫂嫂）在傳遞訊息上發生了一點作用，原來大哥、二哥是不准與外界，包括家人互通消息的。我們都用綁在襯衫鈕釦的捲小信紙來與他們聯絡，就像小說一般，但這種溝通方法很費時費心思。不久之後，警察局裡貪腐的情況一一呈現，大哥與二哥相比，逮捕大哥的人要比較厲害；那時用的手法是先說大哥在第一科，等第一科東西和錢拿到手後，就把大哥交給第二科，第二科如法炮製以後又輪到第三科揩油。揩的油各科不一，例如說消息傳來第一科科長的太太要一台縫紉機，到了第二科會傳來消息說科長的太太要一枚戒子等等。等到警察局揩完了油，他們又說大哥交給了憲兵隊，這讓本來就不是怎麼富有的我們，很快就傾家蕩產了。這使我想起柏楊在其回憶錄中所言：「不，這是恐怖下的產物，中國人沒有管束自己的能力一般。當時的政治腐敗到極點，而軍事是政治的延長，軍風紀蕩然無存，國軍和土匪海盜沒有分別，不要說從來不排隊，甚至從來不買票。」（請參考《柏楊回憶錄》

二哥的「罪狀」較輕，因為他大半的時間都不在新竹，而新竹與台中似乎沒有靈通的內應互
第一七一頁）

通，所以他前後只關了十五天就被放出來了，但大哥卻關了四十五天。竹中有沒有表態？究竟大哥是竹中的老師；竹中有動作並表了態，據稱校長曾赴警方要求釋放大哥，但一個中學的校長，警察局才不管呢！事情到憲兵隊時，大哥關在牢中的事已近尾聲，故最後是竹中的訓導長鄭啓中先生出面保證而發生了效果。

二二八事件於一九九六年政府做了賠償的舉動，這中間也牽涉到林宗義教授，因為待二二八事件平反時，林教授已是總統府資政，而且是二二八事件受害人家屬代表。但我們也沒有因而找上林宗義教授，只知道二哥獲得五、六十萬新台幣的賠償，大哥的賠償則是上百萬。

二二八事件是國民政府對台灣的估計錯誤，是一個明顯的失策。如果那時估計正確，最初派來接收台灣的如果是水準與台灣相當的單位，嚴守紀律，該繳回國庫，不該私吞或變成黨產的就不該變成黨產，就會減低台灣人對大陸人的反感。

另有一我心靈的小感想是，我們從大陸時代國民黨一成不改的人事、會計一條鞭的問題。一條鞭的緣由起自於杜絕貪腐，但這制度有沒有發生預期的效果？事實擺在眼前，答案是否定的！任何行不通而缺點照舊的制度都要設法改掉。有一個派到成大查帳的審計部人員曾經說過：「我們連蔣

經國說什麼都不聽！」我要問的是：

領款通知書

受款人：黃麗鳳女士。

台端向本會辦理之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補償金申請案，編號：〇一五八號
受難者姓名：黃麗鳳，性別：女，年齡：三十二歲，本會第十一屆董委會決議案通過，審定
受難事實：傷殘，被槍擊，送醫後，因公務繁重，未及送醫，審定補償額數五個，
金額五十萬元。呈由本會公告一箇月無異議後，依法發給補償金。

一、領款日期：

（一）台端請於中華民國 87 年 8 月 27 日起五年內，每週之

星期二下午二時半至本會領取補償金，遇假日停止受理。

（二）補償金自本會通知領取之日起逾五年未領取者，歸屬二二八事件

紀念基金。

二、領款應備文件：台端必須備妥如下規定文件，親至本會領取補償金。

（一）領款通知書。（領款人如係受難者家屬，應同時檢具本通知書附

件—親屬關係證明書切結書。）

（二）身份證正本。（無本身份者持護照，大陸人士持海基會認證書。）

（三）印鑑證明。

三、領款本人親自辦理，如有下列情形者得委任代理人領取：

（一）行動不便者，除檢附第二項所定各款文件外，並應出具委任書（蓋用委
或熟治產宣告證明）。

（二）未成年人：應檢附我國駐外辦事處認證書。

（三）移居國外者：應檢附我國駐外辦事處認證書。

（四）大陸地區人士：應檢附海基會認證書。

四、代理人領取時，除依前項備妥有關文件外，並應出具委任書（蓋用委
或熟治產宣告證明）。

五、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暨本會董委會決議辦
理。

不能永遠以文明大國（中原文化）自居，要知道歷史上有二十一個古文明，其中十四個已經絕跡，六個則瀕臨絕種，只有古希臘文明轉化成了工業文明，席捲世界。



從歷史系到醫學系

我雖然是在竹中表現優異的學生，但從未得到班上第一名，更遑論不是同班但同期的學生。在我們的班上，最多我總是第二名，班上的「狀元」是湯廷尉同學，他真是聰明過人的學生。但我的長處就是我比較廣，廣的程度雖比不上我三哥，也沒有像他一樣深化各領域，但他和我的長處不同，我較能包容他人，和別人的關係較好。

竹中那時有從初中部念完後直升高中部的制度，但我並未名列其中，必須和別人筆試競爭，成功了，才入高中部。我認為這也表示我程度不夠，考高中對我仍是囊中物，我也就這樣進入了竹中高中部。

我在竹中高中更是鋒芒畢露，玩了不少，也念了不少書，我也漸漸地看出自己的興趣之所在。那時有一位教歷史的趙老師，我對他的歷史陳述特別入神；我生性愛歷史，看別人的自傳是我的最愛。

竹中沒有依照性向而分班，我高二時已經下定決心要考歷史，以歷史為一生的軌道。後來事

與願違，並沒有投考歷史系，不然依我的聰慧程度，大概靠歷史吃飯是沒有希望的。最近台大的黃俊傑教授也慶幸我後來沒有投考歷史系，他說學歷史猶如在高速公路開車，一小時一百公里也開，五十公里也開，是很苦的事。我開小車上歷史這高速公路大概只能開八十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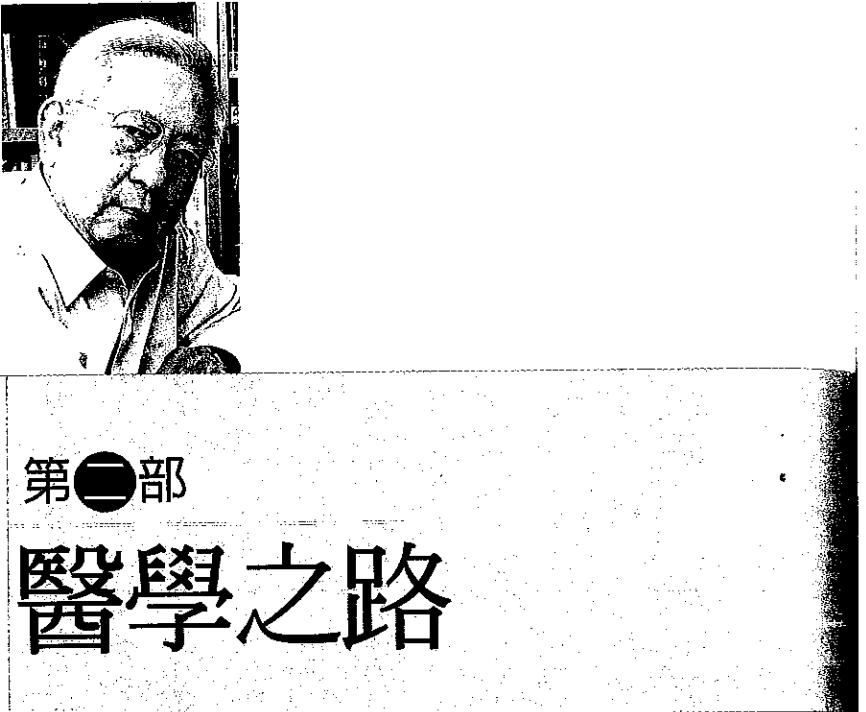
竹中既不分班，那時也沒有所謂的聯考，沒有人好商量，而下定決心是個人的問題，我硬是準備考台大歷史系，結果被大哥南下新竹臭罵一頓。

眼見台大和幾個學校的考試只剩三個月，已迫在眉睫，大哥有一天從台北南下新竹，到了家就捉著我訓了一頓，他說：「研究歷史將來想吃什麼飯？」想起來也對，我一九六三年負笈美國，目睹塔克曼 (Barbara W. Tuchman) 之類的大眾歷史家，為大眾必要的作品，也要一定資料的蒐集及分析，這也是歷史家的責任。但這一群大眾歷史家都受到真正歷史學家的鄙視，如果我學歷史，大概也會遭受同樣的命運，這和我之後雖學醫學但也沒有成為醫生從事醫業是同一個道理。

大哥那時已經從二二八的陰影走出來，開始展現他的組織能力而成了南港輪胎公司的創辦人，因此他的話更有了份量。在二二八事件受盡苦頭的他，現在卻連手下的國民黨員也管，由他口中娓

娓道來，這些事特別有味道，也看透事情時過境遷就大不同的道理。當時他替我出了主意說：「你準備投考醫學好了！」

我那時也等於沒人商量，嚴肅的家裡，有這麼一位對家庭最後希望的老公這麼關心、期許的大哥，也是一個福氣。我只好放棄了考歷史系的念頭，轉而準備醫學系的考試，如上文所述，這時距離台大的考試只剩三個月。



踏入醫界

很多世界有名的教育家都開始覺得要一個高中畢業生選擇生涯工作是太早了一點，台灣的現況就是如此。但這也要看小學與中學以及整個社會的學問水準與素質，像台灣一樣的社會水準，怎能比得上英國或美國的情況呢？這是現實的問題。

我是一九五二年竹中畢業的，那時覺得像樣、可以報名投考的學校不多，只有國立台灣大學、省立師範學院、省立台中農學院、省立台南工學院四間。我報名投考了兩間學校，第一是台大醫學院的醫學系（叫醫科），第二是念都不想念的省立師範學院數學系。那時候聯考這玩意兒還沒有人提議，每一間學校都是單獨招生，還記得國文考試得自己帶硯台、墨以及毛筆。試題就不是考入竹中時那麼簡單了，雖然國文也受了六年的薰陶，現實環境也不同，人也不同了，但我考入台大醫學

系的本錢還是靠英文與數學，這兩科的分數特別高而救了我，這也同時要感謝彭商育老師。

—彭商育老師—

我與竹中彭商育老師的關係橫跨竹中與台大，特別值得大書特書。彭商育老師是湖南人，與毛澤東同鄉。他普通話的口音很重，我現在跟他談話也是非懂似懂的，以這個普通話的程度，怎麼使彭商育老師在竹中嶄露頭角，再能成為名震全台的數學名師是個謎。我猜想有一個原因，是他會把他要講的話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在黑板上，而且他寫在黑板的字清晰可讀，故方便了許多學生。

他也用鋼板把他所講的寫成講義，而我因為寫得一手好字，被選為寫鋼板的主要人物。所謂鋼板，是電子郵件與傳真機問市以前的東西，用的是一種半透明薄膜臘紙，以鐵針筆在糙面鋼板上刻寫，然後以油印機印刷。刻寫的力道和手寫的筆跡，是決定這份印刷是否清爽宜眼的主要因素；而一張臘紙的耐印程度，通常不超過五百份就報廢了。寫鋼板字要寫得漂亮以外，還有要件，就是要將寫鋼板用的臘紙鋪平，以極細的筆在上面寫字畫線，看得出所寫的東西，這也是以前出版商除打入



與竹中同學合影，中坐者為彭商育老師。

字印刷以外出版刊物的方法之一。我就是負責為彭老師寫解析幾何的講義，以利他溝通的人物，當然這些事都有報酬的。

這工作持續到我到台北後的一段時間，後來怎麼停止的我已不記得了，不過在尚未結束之前，台北新竹間的來往都是用紙筒的，而因寫鋼板所獲得的收入，添補了我不少零用錢。

—幣制改革—

那時候整個社會的經濟狀況很壞，通貨膨脹已在上文提過，弄到後來不管是旅遊、薪俸都是節節上升，連我父親的薪水也變了一個樣。

那時候的薪水是現款帶回家，後來所領的錢多達百萬元，連用扁擔搬都有點困難，所以後來改

發所謂的銀行本票。但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對政府來說，通貨膨脹是經濟政策上的一個癌，它控制失靈，政府會因此垮台是一個現實的問題。記得那時四姊在台灣銀行就職，有一天她下班回來，

說幣制已經開始變革了，當時統治台灣的行政長官是陳誠，他把台幣分成舊台幣與新台幣，呼籲民衆把舊台幣換成新台幣，兩者的比例是四萬元舊台幣等於一元新台幣。

好在這幣制改革並未引起像金元券在上海的擠兌，金元券制度的成果可以說是曇花一現，台灣當時的幣制改革沒有搜刮黃金的意圖，金元券事件據稱到底還是搜刮人民黃金勾當。那時候的台幣與美元兌換比例是一比三十六，但在黑市的兌換率是一比四十六上下，這樣一看，美元也經歷了不少滄桑。美元在我一九八一年回台後，依照後來採用的活動匯率，曾經掉到二十五塊多新台幣呢！

—北上求學—

我搬到台北註冊而入了台大的醫學系，住的是位於信義路與新生南路交接處的大華莊，而不是宿舍。大華莊是日式的兩樓公寓，一個單位只有一個房間，廚房是共用的。我大哥結婚後搬到台北，與三哥分租的是叫楊金龍的一個公務員，而我住的是二樓的一個房間，與我分租的是一名叫黃國忠的台大心理學系畢業的老師。所有的房間都只有四塊榻榻米大，在這麼小的房間，我大哥要維持他們一家（嫂嫂及長子鴻欽、長女玲燕）的確不是容易的事。我和三哥曉得這件事情卻說不出口，這是家風使然，無可奈何，我嚴守家訓，行為從未出軌，這是母親幾句訓話的結果：「你知道在心裡就好。」

黃國忠是蘇鄉雨教授的子弟，蘇教授因出身新竹，故我們都非常瞭解他的底細。上文說過，我竹中的鄰班好友傅偉勳，後來是台大哲學系畢業的高材生，因為哲學系與心理系關係密切，傅偉勳對黃國忠私事更是瞭若指掌，例如黃國忠對自己的月薪毫無節度，到了月末總是沒錢，每天日夜皆睡覺過日子是他很熟習的事。總之黃國忠是一個怪人的事實，傅偉勳及其同黨人，包括我皆清清楚楚。後來黃國忠找到位在台中的一家精神病院的工作，消息傳到台大，傅偉勳一黨知道黃國忠入了精神病院後，喃喃地說：「想不到這麼快他就入院！」其實，黃國忠是為了從事心理治療的工作而

去該病院的。

整個台北市當時還沒有發達起來，沿著新生南、北路的瑠公圳尚未加蓋而暴露在陽光底下，新生路被分為兩條。瑠公圳後來還因為一起分屍案上了報，成了台灣治安變壞的警訊。我呢，每天就沿著新生南路騎腳踏車上學。

—父親的逝去—

我們聽到父親的噩耗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清晨，住在台北大華莊的每一個家人都一起搭了公路局的國光號，一路晃回到新竹。那時公路各段尚未鋪成柏油路的路段還很多，台北新竹段就是其中之一。

父親未能等到我成家立業才辭世是我一生很大的遺憾，其實我們住在台北的一群人都錯過了見父親最後一面！他患有高血壓但未經過治療，怕的是會花錢，影響家計。在這個情況之下還每天騎腳踏車到新埔上班，病重時才請來李賢豪醫師。李醫師是我四姊嫁去的夫婿，念了日本的醫學校，當時我們一家人就照著台灣的習俗為父親舉行了葬禮。

醫預科課業輕鬆，我的腦筋馬上就動到課外活動上。那時台大已經有一個合唱團叫友愛合唱團，英文叫Glee Club。友愛合唱團的歷史悠久且傳統已經建立，團長及指揮是電機系的林一，電機系畢業後，他放棄了專業而改學電子音樂。友愛合唱團既已存在，於是其他在中學時就愛好音樂，尤其是合唱團的台大新生們於是另起爐灶而組織了鐘聲合唱團，後來還辦得有聲有色呢！

鐘聲合唱團的創辦人是建國中學的畢業生黃維寧，他是一位患有氣喘的同學，他糾集了一些建國中學畢業、愛好合唱的同學來找我，畀以第二指揮之位。我本來就喜歡合唱團，故欣然接受。因為我也擅長寫鋼板，還記得鐘聲合唱團的樂譜都是我寫的。那時的團員有男高音的施敏生、台電總經理黃輝的女兒黃紫金、後來成爲榮總醫院護理長的王唯，以及很多現在已經記不起

的名字。每年兩次的音樂會裡，我會指揮過「我要歸故鄉」，這是首很大的曲子，黃維寧則指揮合唱團唱過黃自寫的「長恨歌」。

這好景持續了兩年，每次練習皆在台大的普通教室，那時的團員出席率非常高，可見大家熱心與認真的情緒。

醫預科是現在醫學系的預科，醫學系要念七年，我們入學當時的一九五〇年代，前兩年醫預科屬於理學院，這是台灣（日本）文化與美國文化的「雜交」而成的制度。一九一〇年時，美國醫學教育的改革者已經把美國變成世界醫學的王國，而所有美國的醫學院皆成爲後醫系，比起我國的醫預科，美國的醫預科等於是大學的四年，比我們還多兩年。

但醫預科再短也值得，在醫預科，我們學了普通大學的核心課程，即國文、英文、國父思想、近代史、化學、物理，此外更學了動、植物學、微積分、有機化學、分析化學、德文、拉丁文、心理學，以及比較解剖學等。這些知識有的後來對醫業有用，有的卻一點用都沒有。但我特別喜歡拉丁文及德文。

上文說過語言是一種工具，是做學問的基礎，我至少掌握了這一點，於是乎我特別下功夫學

了拉丁文及德文，這兩種語言的認真學習最後都發生了良好的效果，尤其在解剖學及微生物學方面。很多人，尤其是學士後醫學系的學生認為微生物的名字很難記，但如果知道微生物名稱的拉丁文、德文或英文的來源，記這些名字就可以事半功倍，並不很難。周學普教授對教德文有特別的要求，上文也說過，我跟他學德文，在一年以後，即第二學期的期末，已經帶著我們讀《茵夢湖》(Immensee)。《茵夢湖》的作者是史東(Theodor Storm)，故事繞著伊莉莎白(Elisabeth)及蘭哈特(Reinhardt)而展開，是一部纏綿的文學小說。

台大的英文課當時是以入學考試的表現分班的，我被分配到的那一班老師是一位名叫塔克(Mrs. Tucker)的美國太太。我最得意的是我的英文作文、寫故事，塔克女士也很喜歡我的文章，每次在我的文章文尾都寫有相當詳細的評語，而且有許多指正。

記得有一次她在課堂上說：「你們選字講話要小心，昨天是禮拜天，我在台北火車站遇到一些同學，問她們今天做什麼，結果她們的回答是“*We want go to Yang-Ming Shan to play.*”“Play”這個字不是我們普通話『玩』的意思，是指三、四歲小孩無所事事，隨便大叫跑跳，它並不指成人去陽明山玩的那種『玩』。另，“play”如用在成人，則戲謔、操縱的意思較多。」這使我楞了一下，

這是選錯一個字，講出口了就禍從口出的一個好例子。

塔克女士非常重視英文的重音，外國的字和中國的四聲相似，也有抑揚頓挫，但外國字沒有嚴格的四聲，頓挫語氣不對的問題比起中國的普通話不嚴重，但不能就此一概蒙混過去。我一九六二年負笈美國時，就會因“police”一字的重音不對而搞了半天對方還聽不懂，以致與對方的溝通中斷的經驗，要知道“police”的重音在後半段。

學外文最重要的原則是外國人怎麼說，學習者就怎麼說，切勿標新立異。任何語言發音方面都沒有標新立異之餘地，只有在寫成文章時才有製造新名詞的可能，唸的時候還是照習慣用法唸它。譬如說李敖曾經把陳文成變成動詞用，唸這文章的人都明白李敖在說什麼，是好例子。

— 學習與現實運用 —

上文說過，我不知道在醫預科所學的東西什麼有用、什麼沒有用，不過所學東西的內容和現在大不相同是真的。最近有一位美國作者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到美國大學的醫預科所教的與他們之後

從事的醫業不合，這是真話。我相信台灣的各醫學院都在改革，只是改革的步驟與內容有點太慢而已。譬如說，他在文章裡就問微積分有沒有用？我們念醫學系的時候學的統計學和現在的統計學完全不同，要知道每一種疾病都有一個統計相，而統計學已經成了每篇文章必具的成分。

雖不屬於醫預科，微生物學及生化學也有了徹底的改變。微生物學的病毒學方面，以前可能在三個鐘頭就打發完了，現在則變成一本書了，醫預科的老師們不能不特別注意。在台灣最受詬病的缺點是社會學，美國愛滋病防治協會的負責人弗斯特（Mr. Foster）就曾在一次國際會議中指陳台灣一般大眾對台灣的社會瞭解不深！

什麼叫社會？社會是生活共同體，它的文化與作爲或表徵都是共同體成員行爲規範的累積。要知道，台灣只是一個島國，控制疫情很容易，但我們對這共同體的文化，即社會學卻瞭解不多。弗斯特先生舉的例子很簡單，他說他參加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行的國際愛滋病防治會議三天，在他下榻飯店的隔壁有一家三溫暖，他去該三溫暖看個究竟，因為國際上已經知道三溫暖是男同志經常出入的地方。結果進了店，老闆就給他一個禮物，他打開這個禮物，裡面是三支香菸。他說如果三溫暖老闆知道三溫暖是愛滋病傳染重要據點的話，送的禮物應該是三個保險套而不是三支香菸，遑論告赫爾辛基有關捐贈器官給別人的規則改了四次？

—與太太邂逅—

我們班上一共有七十個人，這是學校規定當時每年培養的醫師數目。那時台灣的人口只有八百萬人左右，每年培養七十位醫師來填補因退休、辭世而流失的醫生人數還夠。現在台灣的人口已膨脹到兩千三百萬人，但近年來因爲出生率降低而人口已逐漸下降，因此，現在的政府，尤其是衛生署，訂的培育上限是一年培育一千三百位醫師，並未改變，這需要多所醫學院一起用同樣的標準來設校並推行醫學教育才可。澳洲的人口和台灣的一樣，故該國的醫學教育政策可以借鏡，澳洲也有十一所醫學院，與台灣可以相比。